

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家庭和同伴维度以及与城镇初中生的比较

苏群, 邢义青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基于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的维度, 并采用城镇初中生作为参照组,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数据, 探讨了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 结果表明: 家庭环境是抵御不良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 优质同伴的榜样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不良行为, 而结交不良同伴则会对个人不良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相对城镇初中生而言, 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上述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 家庭和同伴因素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均大于城镇初中生, 在中西部地区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更大。

关键词: 农村流动初中生; 不良行为; 家庭环境; 同伴效应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9)06-0038-08

Factor analysis of rural migran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iscondu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amily and peer dimensions and urba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 Qun, XING Yiq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eer effects, and taking urba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reference group,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Tracking Survey (Academic Year 2014-2015),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migran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isconducts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environment is a vital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the misconduct while the role model of high-quality companions can somewhat restrain the students' bad behaviors. However, making friends with bad companions will deteriorate the individual misconduct. Compared with the urba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above effects of rural migran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more significant. Whether in the eastern region or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peers on the rural migran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isconduct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urba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remark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 rural migran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isconduct; family environment; peer effect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流动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社会现象。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正在经历家庭化过程,子女随迁逐渐成为常态,流动儿童的规模不断壮

大。所谓流动儿童,指的是那些跟随父母离开户籍登记地到其他地方流动的儿童,即流动人口中的0~17周岁儿童^[1]。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流动儿童规模日益扩大^[2]。与普通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面临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各种压力,其身心和行为发展过程中潜藏更多的危险性^[3,4]。行为发展具有过程性,初始的不良行为,可能会演变至后来的学业和社交失败、反社会行为等,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行为和犯罪行为^[5]。因此,探讨流动儿童的不良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推出适当干预

收稿日期: 2019-11-2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61140370);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 苏群(1968—),女,宁夏银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

举措,对其健康成长乃至社会稳定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学界对流动儿童不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探讨。李嘉怡、孟小等对上海市 4 所中学的非上海户籍儿童调查发现,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父母的控制、父亲的温暖对流动儿童的违纪及攻击行为有负向影响^[4,6]。也有学者将家庭的各种特征因素进行整合,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冯淑丹、张煜萱实证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家庭功能与不良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家庭功能越好,流动儿童的不良行为越少^[7,8]。卿再花基于长沙市三所初中的实地调研数据得出,流动初中生各类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大部分因子呈显著相关,并能被家庭环境的部分因子预测^[9]。

文献梳理表明,已有研究多从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功能层面研究流动儿童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缺乏对同伴因素的考察。家庭、同伴和个体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10]。为此,笔者拟基于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维度,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2014—2015 学年数据,以农村流动初中生^①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城镇初中生作为参照组,对其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庭环境对不良行为的影响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环境是个体发展的微系统,对个体的发展和适应具有重要意义^[11]。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有效地预测孩子较少的违纪、犯罪、攻击和退缩行为^[12]。而在父母冲突较多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13]。一般来说,父母会通过关注、指导和约束子女参与的活动等等监控方式规范孩子行为,有效的父母监控能够减少孩子不良行为的发生,而父母监管不力则与孩子违法违纪、物质滥用等不良行为增加有关^[14,15]。因此,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抵御不良行为的保护性因素,父母的关怀和疏导能够为孩子提供正向支持与帮助,而父母对孩子社交情况以及外在表现的关注也能够降低其染上不良行为的风险。但相

比于城镇初中生,农村流动初中生经历了家庭式迁移,“流动”往往会削弱亲代照护和亲子互动,而且城乡之间在文化、生活习惯、教育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其在家庭环境上处于劣势,家庭系统抵御不利因素对孩子冲击的能力因此减弱,进而使农村流动初中生相对于城镇初中生产生更多不良行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₁: 初中生的家庭环境越好,不良行为越少。

H₂: 家庭环境对农村流动和城镇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2. 同伴效应对不良行为的影响

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逐渐减弱,同伴的影响日益显著,成为家庭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化环境^[16]。个体会通过观察同伴的行为及其强化结果而习得某些新的反应,或者纠正其已经形成的某些行为反应^[10,17,18]。如果经常与不良同伴交往,同伴群体特征会导致个体产生不良的态度和行为表现^[19-22]。对农村流动初中生来说,他们生活、学习地点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重新构建同伴关系和维持同伴互动^[3]。在融入新的同伴群体的过程中,他们会模仿同伴的一些行为方式,也可能迫于同伴压力像他们那样频繁参与饮酒、吸烟、逃学等不良行为,而当他们被同伴拒绝或不被接纳时,其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易产生愤怒、敌意的反应^[23]。此外,“流动”往往会导致家庭环境恶化,因而流动初中生容易结交不良同伴来发泄负面情绪,并通过分享和学习不良行为来获得同伴的支持,以弥补家庭情感支持的缺失^[24]。相比之下,城镇初中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未改变,容易与优质同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加之父母的监管和控制,其结交不良同伴的可能性较低。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₃: 同伴积极行为对初中生不良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而同伴消极行为则会促进其不良行为的发生。

H₄: 同伴效应对农村流动和城镇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CEPS 以 2013—2014 学年初一和初三学生为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

量进行了基线调查,旨在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此后还对2014—2015学年的初中生进行了实地追访。另外,CEPS同时也将全体被访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班主任老师及任课老师、学校负责人等列入调查范围,因而更好地融合了个人及其所居家庭、所处班级、所在学校等相关情况,便于系统分析各层变量的联合效应^[25],在反映初中生成长与发展的状况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本研究数据为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根据CEPS数据库中“户口类型”“户口登记地”及“现居地”三个变量,将跟随父母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其他地方就学的农业籍初中生定义为农村流动初中生,作为对照组的是那些与父母共同生活在户口登记地的城镇户籍初中生。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958个农村流动初中生和2781个城镇初中生样本。

2. 变量选择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不良行为”。CEPS向学生询问了“过去一年中,你有没有下列行为”,包括骂人、说脏话,吵架,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打架,欺负弱小同学,逃课、旷课、逃学,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抽烟、喝酒,上网吧、游戏厅等10项内容,将每类行为中的“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5。经检验,该量表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3,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上述指标的公因子,标准化后得到一个取值为-0.5851~7.7089的不良行为变量,数字越大表示学生不良行为越多。对提取后的变量进行KMO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KMO值都在0.83以上,表明原始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2) 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

一是家庭环境。使用父母监管、亲子沟通、亲子活动、父母关系、亲子关系等指标来测量家庭环境。父母监管由父母对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监管程度的相关变量组成,主要包括作业考试、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时间、在学校表现以及和谁交朋友六个方面,并将监管分为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三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2和3,加总后得到

一个取值在6~18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父母监管越严。CEPS问卷中涉及亲子沟通的问题是“家长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以下问题?”包括孩子的心事或烦恼、学校发生的事情、与老师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将“从不、偶尔、经常”三项分别赋值为1,2,3,加总后得到一个取值在4~12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代表亲子间交流越频繁。与亲子活动相关的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三个方面,根据活动频率分为“从未做过、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以上”六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6,获得一个取值在3~18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亲子活动参与频率越高。有关亲子关系的问题是“与父亲、母亲的关系怎么样?”选项均为“不亲近”“一般”“很亲近”,分别赋值为1,2,3,获得一个取值在2~6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亲子间关系越融洽。衡量父母关系的问题是“你父母之间关系好吗?”选项为“好”“不好”,本研究将其设为虚拟变量,不好=0,好=1。为了数据分析的简约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上述五个指标的公因子,根据特征值和碎石图保留2个主成分,经由方差贡献率综合生成标准化的家庭环境变量,取值范围为-2.6374~1.0025,数字越大表示家庭环境越好。

二是同伴效应。根据CEPS问卷中“几个好朋友有没有以下情况?”来衡量同伴效应。将问卷中学生好朋友的行为分为积极行为(学习成绩优秀,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与消极行为(抽烟、喝酒,违反校纪,逃课、旷课、逃学,打架,经常上网吧、游戏厅,早恋)。根据回答,进行以下赋值:没有这样的=1、一到二个这样的=2、很多这样的=3。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朋友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提取公因子,生成新的标准化的连续变量“同伴积极行为”“同伴消极行为”。积极行为的取值范围为-4.0286~1.6066,数字越大代表同伴积极影响越大;消极行为的取值范围为-1.0321~11.3856,数字越大代表同伴的消极影响越大。

(3)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特征。

个体特征除了包括性别(女=0;男=1)和认知

能力等基础变量外,还包括被访初中生的班级融入和学校适应变量。关于认知能力,CEPS 从语言、图形与空间、计算与逻辑三个维度对初中生的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进行了测试,本研究采用基于 3PL 模型生成的标准化得分来衡量学生认知能力。另外,CEPS 询问了学生“关于学校生活,你是否同意下列说法”,包括班级同学对我很友好、我经常参加班级组织的活动、我所在班级班风良好、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我在这个学校感到很无聊和我希望能去另一个学校,每题对应四个选项,取值 1~4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根据主成分法因子分析,综合生成班级融入和学校适应公共因子,取值范围分别为-3.261 3~1.899 5、-3.289 8~1.408 7,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班级融入和学校适应情况越好。上述指标对应的 KMO 值为 0.751,表示各指标之间的偏相关性较强,可进行因子分析。在正交旋转后,根据特征值保留 2 个公共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 66.07%,能够解释总变异的大约七成。

家庭特征主要考虑父母教育水平及家庭经济条件。其中,父母教育水平采用父母二人当中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CEPS 问卷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 9 类,本文根据“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6、初中=9、中专/技校=11、职业高中/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将其换算为受教育年限,作为连续变量代入模型。对于家庭经济条件,问卷分为 5 大类,根据需要将其分为困难(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中等和富裕(比较富裕和很富裕),以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为参照组。

班级特征主要着眼于被访初中生所在班级的整体水平(中下及最差=0;中等及中上=1;最好=2)。学校特征则着力考察学校排名(中间及以下=0,中上及最好=1)和校内氛围。问卷设计了关于学校学生不良行为发生频率的问题,包括学生吸烟、饮酒、破坏公物、打架斗殴、校内或者校外的帮派活动,选项为“从未发生”“一到四次”“五到十次”“十次以上”,分别赋值为 1,2,3,4,本研究将其作为衡量校内氛围的指标,同时转换为正向赋值形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新的标准化变量,取值范围为-0.655 2~3.695 7,数字越大代表校内氛围越好。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农村流动初中生		城镇初中生		T-test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不良行为	0.076	0.983	-0.115	0.725	-6.189***
家庭环境	-0.049	0.555	0.085	0.547	6.979***
同伴积极行为	-0.206	1.570	0.290	1.405	9.728***
同伴消极行为	0.168	2.102	-0.221	1.932	-5.664***
性别	0.557	0.497	0.497	0.500	-3.516***
认知能力	0.250	0.826	0.502	0.785	9.304***
班级融入	-0.007	1.009	0.086	0.974	2.828***
学校适应	0.009	0.975	0.124	0.926	3.581***
父母最高教育水平	9.787	2.356	12.842	3.010	36.117***
家庭经济条件	0.970	0.441	1.108	0.480	9.257***
班级整体水平	0.914	0.575	0.967	0.542	2.826***
学校排名	0.561	0.496	0.865	0.342	19.980***
校内氛围	0.188	0.755	-0.009	1.058	-6.953***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1)显示:第一,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发生较少,总体发展情况比较乐观。但相比于城镇初中生,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不良行为明显较高,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第二,以城镇初中生作为对照,农村流动初中生的家庭环境相对较差,身边朋友中不良行为者较多,优质同伴较少。这说明农村流动初中生的家庭环境因流动而恶化,家庭因素对其抵御不良行为的保护性作用减弱,他们更易结交不良同伴,而城镇初中生由于其生活环境(包括家庭与社区)未发生改变,他们的家庭环境和同伴关系相对良好。第三,从个体特征来看,城镇初中生男女性别均衡,而农村流动初中生中男孩更多,说明家长倾向带男孩进城,把女孩留在家乡,让男孩享用较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此外,农村流动初中生的平均认知能力偏低,在班级融入和学校适应上的表现欠佳,与城镇初中生存在明显差距。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来看,农村流动初中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城镇初中生的父母最高教育水平达到高中以上,而农村流动初中生的父母多为初中学历,城镇初中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比农村流动初中生要富裕。从班级和学校特征来看,相比于农村流动初中生,城镇初中生所在班级和学校排名均靠前,其就读学校的校内氛围也存在一定差距。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1. 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考察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会对初中生的行为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Behavior = \beta_0 + \beta_1 Fam + \beta_2 Peer + \sum \gamma_i X_i + \mu$$

Behavior 指学生的不良行为情况, *Fam* 表示学生家庭环境, *Peer* 表示同伴效应, X_i 表示需要控制的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层面变量, μ 是误差项。

通过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2)可以发现,全样本中农村流动初中生的回归系数为 0.0502,在 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得分明显高于城镇初中生。家庭环境是影响初中生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表现为家庭环境每提升 1 个等级,初中生不良行为相应减少 0.0982 个单位 ($p < 0.01$),说明父母对初中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监督管理、父母之间稳定良好的婚姻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融洽的相处、高频率的交流互动是抵御不良行为的非常重要的保护因素, H_1 得到支持。进一步对比该影响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家庭环境对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保护性作用显著高于城镇初中生, H_2 得到验证。同伴积极行为对初中生不良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因为同伴的榜样示范行为强化了初中生对学习的认知,而初中生自身的学习态度将对其社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17]。而同伴消极行为则对初中生不良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同伴发起或参与抽烟、喝酒、打架等不良行为时,会对自身不良行为进行强化^[17]。以上结论验证了 H_3 。在群体之间,同伴积极和消极行为对农村流动初中生的影响效应均显著高于城镇初中生,说明同伴关系对流动初中生的行为发展表现出更大的影响力,这支持了假设 H_4 。以上表明,随父母迁移到陌生的环境,初中生对家庭的依赖变大,当其无法从家庭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时,亲密关系由父母转向同伴,易受同伴行为的影响。

在个体及家庭层面,无论是农村流动初中生还是城镇初中生,性别、认知能力和学校适应均是影响其不良行为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男生的不良行为多于女生,认知能力越好的初中生不良行为越

表 2 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

变量	全样本	农村流动	城镇
农村流动	0.050 2 [*] (0.027 5)	—	—
家庭环境	-0.098 2 ^{***} (0.020 8)	-0.228 ^{***} (0.050 3)	-0.060 8 ^{***} (0.021 8)
同伴积极行为	-0.051 3 ^{***} (0.008 21)	-0.078 3 ^{***} (0.019 0)	-0.040 5 ^{***} (0.008 81)
同伴消极行为	0.126 ^{***} (0.005 99)	0.156 ^{***} (0.014 2)	0.116 ^{***} (0.006 34)
性别	0.142 ^{***} (0.021 7)	0.174 ^{***} (0.054 5)	0.125 ^{***} (0.022 5)
认知能力	-0.065 5 ^{***} (0.014 9)	-0.087 2 ^{**} (0.033 8)	-0.052 5 ^{***} (0.016 0)
班级融入	-0.027 6 ^{**} (0.011 7)	0.045 6 (0.028 4)	-0.050 9 ^{***} (0.012 2)
学校适应	-0.103 ^{***} (0.011 9)	-0.077 4 ^{***} (0.027 8)	-0.111 ^{***} (0.012 7)
父母最高教育水平	-0.001 54 (0.003 92)	-0.000 217 (0.011 3)	-0.002 76 (0.003 94)
家庭经济 中等 条件(参 照: 贫困)富裕	0.029 0 (0.041 4)	-0.142 [*] (0.082 0)	0.124 ^{***} (0.047 7)
班级整体 中等及以上 水平(参 照: 中下 最好 及最差)	0.012 7 (0.028 3)	0.045 3 (0.064 7)	0.006 71 (0.030 4)
学校排名	-0.055 0 [*] (0.028 7)	-0.036 7 (0.052 9)	-0.079 9 ^{**} (0.034 9)
校内氛围	-0.026 5 [*] (0.014 2)	0.001 65 (0.037 0)	-0.040 2 ^{***} (0.014 6)
常数项	-0.062 5 (0.067 0)	0.055 3 (0.141)	-0.114 (0.071 3)
样本量	3,739	958	2,781
R-squared	0.256	0.278	0.244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少,学校环境适应能力越好的初中生不良行为越少。在城镇样本中,班级融入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初中生班级融入状况越好,其不良行为越少,而在农村流动样本中,班级融入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类群体中,家庭经济条件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但影响方向相反:随着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流动初中生的不良行为减少,而城镇初中生的不良行为增多。在班级和学校层面,班级整体水平、学校排名和校内氛围均对城镇初中生不良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发生在农村流动初中生中。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得益于《关于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政策，流动初中生得以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但民工子弟学校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市郊地区，仍扮演重要角色^[26]，这些学校同质性较强，在办学条件、管理规范程度等方面远赶不上其他公立学校，因而在农村流动初中生的行为发展过程中作用相当有限。

2. 初中生不良行为影响的地区差异

根据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流动人口的流向一致，流动儿童向东部集中，2015 年全国流动儿童中有 48.8% 集中在东部，剩余各一半集中在中部和西部^[27]。如果将东中西三个地带看成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则东部地带无疑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中西部地区次之^[28]。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势必会对孩子的行为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表 3 展示了东、中西部地区初中生不良行为情况。可以看出，初中生不良行

为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样本、农村流动样本和城镇样本中，中西部地区初中生的不良行为均值都高于东部地区初中生，而在地区内部，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不良行为均值都高于城镇初中生。

表 3 东中西部地区初中生不良行为情况

地区	全样本	农村流动	城镇
东部	-0.085 197 3	0.041 683 6	-0.141 032 8
中西部	-0.061 029 2	0.104 417 7	-0.101 593 0

为考察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对农村流动和城镇初中生不良行为影响的地区差异，本研究按地区将样本分成东、中西部两组，表 4 给出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中西部地区，家庭环境对农村流动与城镇初中生不良行为的边际影响分别为 -0.214 和 -0.0888，且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环境对农村流动初中生行

表 4 初中生不良行为影响的地区差异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农村流动	城镇	农村流动	城镇
家庭环境	-0.223*** (0.0620)	-0.0430 (0.0318)	-0.214** (0.0852)	-0.0888*** (0.0287)
同伴积极行为	-0.0717*** (0.0226)	-0.0504*** (0.0121)	-0.0917*** (0.0352)	-0.0208* (0.0125)
同伴消极行为	0.127*** (0.0160)	0.102*** (0.00866)	0.267*** (0.0309)	0.139*** (0.00915)
性别	0.182*** (0.0629)	0.122*** (0.0312)	0.112 (0.109)	0.132*** (0.0315)
认知能力	-0.0540 (0.0396)	-0.0285 (0.0222)	-0.132** (0.0662)	-0.0926*** (0.0226)
班级融入	0.00501 (0.0336)	-0.0437*** (0.0169)	0.127** (0.0528)	-0.0632*** (0.0173)
学校适应	-0.0795** (0.0322)	-0.119*** (0.0177)	-0.0737 (0.0564)	-0.103*** (0.0176)
父母最高教育水平	-0.00400 (0.0132)	-0.0101* (0.00548)	0.0130 (0.0217)	0.00881 (0.00550)
家庭经济条件 (参照：贫困)	中等 -0.0761 (0.100)	0.103 (0.0782)	-0.238 (0.146)	0.136** (0.0561)
	富裕 0.0170 (0.137)	0.137 (0.0852)	-0.191 (0.257)	0.107 (0.0670)
班级整体水平 (参照：中下及最差)	中等及以上 0.0498 (0.0726)	-0.00739 (0.0441)	-0.0317 (0.154)	0.0229 (0.0415)
	最好 -0.00935 (0.105)	-0.0851 (0.0546)	0.0443 (0.256)	-0.0124 (0.0766)
	学校排名 -0.101 (0.0617)	-0.0976** (0.0425)	-0.0343 (0.122)	-0.106 (0.0794)
	校内氛围 0.0754 (0.0519)	-0.0268 (0.0227)	0.00788 (0.0450)	-0.0137 (0.0113)
	常数项 0.0213 (0.168)	-0.00458 (0.103)	0.163 (0.294)	-0.217* (0.114)
样本量	707	1,663	251	1,118
R-squared	0.242	0.208	0.436	0.323

为发展的保护性作用较大。同伴效应方面,在同等控制条件下,农村流动与城镇初中生同伴积极行为的回归系数相差大约0.071,显示优质同伴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积极影响高于城镇初中生;结交不良同伴对农村流动初中生的消极影响同样大于城镇初中生,两类群体之间同伴消极行为的回归系数相差大约0.128。类似地,在东部地区,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效应也都大于城镇初中生。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家庭和同伴的影响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流动和城镇初中生间相差更大。可能原因在于:东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吸引了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接收了相当规模的随迁子女,这些孩子在城市中待的时间非常长,并不是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1],生活与学习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两类群体不良行为差距不大。而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外出流动人口以低学历为主要特征,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他们在城里的工作大都是不稳定的体力劳动,每天为生计忙碌,给孩子提供的情感支持相对较少,且通常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等环境复杂的区域,孩子易结交不良同伴。如果这些孩子具有与城镇孩子相同的生存环境,将有助于缩小其与城镇初中生行为发展上的差距。

五、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数据,以城镇初中生为对照,探讨了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对比了该影响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显著多于城镇初中生。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环境对初中生不良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对农村流动初中生的影响大于城镇初中生。同样地,同伴效应对初中生不良行为也存在显著影响,同伴的积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减少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发生,而同伴的消极行则会对个人不良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影响效应在农村流动初中生中更显著。第二,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初中生呈现出相对更多的不良行为,同一地区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不良行为较城镇初中生多。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

地区,家庭和同伴因素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城镇初中生,且该影响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两类群体间相差更大。

本研究结论为干预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提供了以下启示:一是农村流动初中生随父母流动导致其所处环境发生较大改变,内心承受的压力增加,父母要改善教养方式,关心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发现他们在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即使忙于生计,空余时间有限,父母也需利用多种方式与子女保持一定频率的交流和互动,使孩子意识到自己并非为家庭所忽视而缺乏支持或约束^[5]。同时,父母还要加强对其同伴群体的关注,充分发挥积极同伴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孩子结交不良同伴,降低其染上不良行为的风险。二是要发挥学校在农村流动初中生行为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农村流动初中生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流动”导致家庭的教育和亲情功能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成为其接受教育、实现自身社会化的重要场所^[9]。对此,教师要积极帮助农村流动初中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随时留意他们的各项表现,学校也可以经常开展家校活动,更好地帮助和促进父母参与。三是无论家庭还是学校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政府应加强对流动学生父母的继续教育,促使其转变教育观念、改善教育方法,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空间。政府也需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打破流动初中生教育机会的户籍壁垒,为农村流动初中生提供与城镇初中生同等优质的教育资源。此外,政府要努力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均衡发展^[27]。

注释:

① 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侧重点的不同,流动儿童也被称之为“流动青少年”、“流动初中生”等。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均是初中生,故在文中将本研究中的农村流动儿童统一称之为“农村流动初中生”。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 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1): 46-50.
- [2] 全国妇联课题组.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 中国妇运, 2013(6): 30-34.
- [3] 金灿灿, 刘艳, 陈丽. 社会负性环境对流动和留守儿

- 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亲子和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12,35(5):1119-1125.
- [4] 李嘉怡.父母教养方式对随迁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 [5] 吴帆,张林斌.父母参与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57-66,18.
- [6] 孟小.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7.
- [7] 冯淑丹.社会支持在流动儿童的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J].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2012(5):40-43.
- [8] 张煜萱.流动初中生家庭功能对问题行为的影响:同一性风格的中介作用[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
- [9] 卿再花.流动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 [10] 田录梅,刘玲玲,袁竞驰,等.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能力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序列中介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3):361-368.
- [11] 彭源,朱蕾,王振宏.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亲子依恋、孤独感的多重中介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4):504-512.
- [12] 夏天生,刘君,顾红磊,等.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32(4):503-512.
- [13] 苏萍,张卫,喻承甫,等.父母婚姻冲突、不良同伴交往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科学,2017,40(6):1392-1398.
- [14] Coley R L, Votruba-Drzal E, Schindler H S. Fathers' and mothers' parenting predicting and responding to adolescent sexual risk behaviors [J]. Child development, 2009, 80(3): 808-827.
- [15] 屈智勇,邹泓.家庭环境、父母监控、自我控制与青少年犯罪[J].心理科学,2009,32(2):360-363,374.
- [16] 侯珂,邹泓,刘艳,等.同伴团体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一项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3):259-267.
- [17] 李峯箫.同侪压力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4):38-47.
- [18] 宋静静,李董平,谷传华,等.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03):303-311.
- [19] Yang Z, Schaninger C M, Laroche M. Demarketing teen tobacco and alcohol use: Negative peer influence and longitudinal roles of parenting and self-esteem[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4): 559-567.
- [20] Schofield T J, Conger R D, Robins R W. Early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in Mexican origin families: Peer selection, peer influence, and parental monitoring [J].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15, 157, 129-135.
- [21] Mann F D, Kretsch N, Tackett J L, et al. Perso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on adolescent delinquency: Sensation seeking, peer deviance and parental monitoring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5, 76: 129-134.
- [22] Seddig D. Peer group association, the acceptance of norms, and violent behavior: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eciprocal effec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4, 11(3): 319-339.
- [23] 田录梅,袁竞驰,刘璐,等.同伴地位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5):535-543.
- [24] 李娜.重要他人行为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9.
- [25] 宋月萍.父母流动对农村大龄留守儿童在校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J].人口研究,2018,42(5):68-77.
- [26] 冯帅章,陈媛媛.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的教育——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2,11(4):1455-1476.
- [27] 吕利丹,程梦瑶,谭雁潇,等.我国流动儿童人口发展与挑战(2000—2015)[J].青年研究,2018(4):1-12,94.
- [28] 赵如婧,周皓.儿童健康发展的比较研究[J].青年研究,2018(1):34-45+95.

责任编辑:曾凡盛